

制度理论视角下 跨国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娟 著

制度理论视角下 跨国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

刘娟 著

内 容 简 介

制度体系本身是空间、时间及人类生存环境综合的产物。制度体系变革及演进不仅对人类社会、组织及个体,更对处于母国与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之下的跨国企业行为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使其在面临更多制度性压力与挑战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制度性机遇与商机。本书旨在系统梳理制度理论视角下跨国企业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期帮助读者对制度理论视角下跨国企业研究的历史脉络及前沿性问题有较为系统及深入的了解。

本书适合对此方面研究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也可作为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制度理论视角下跨国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刘娟著.
—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6.11
ISBN 978-7-5661-1393-1

I. ①制… II. ①刘… III. ①跨国公司-企业管理-研究 IV. ①F27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2124 号

选题策划 张植朴
责任编辑 张志雯
封面设计 恒润设计

出版发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 124 号
邮政编码 150001
发行电话 0451-82519328
传 真 0451-825196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422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http://www.hrbeupress.com>
E-mail: heupress@hrbeu.edu.cn

前言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或其他方式参与全球生产及全球竞争均取得长足进展。其中,母国与东道国间制度距离的客观存在确实对跨国企业东道国市场区位选择、进入模式及其他行为决策和绩效产生不同程度的作用和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多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不再视制度距离为企业海外市场选择不可逾越的障碍(尤其针对那些与别国政经体制等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家),反而越来越重视制度同构作用,并倾向于将探索多种制度学习方式融入东道国制度环境内,以减少因地理距离、制度距离而产生的摩擦,减少跨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经营的不确定性及规避“外来者劣势”,提高跨国企业东道国“合法性”地位及获取更多东道国资源。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多元化特征日益凸显,许多跨国企业也凭借对其母国所固有的价值观、信仰体系的自信及坚守,即遵循其母国制度逻辑,在东道国市场采取一种非确定性行为方式以应对制度性压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在面对母国与东道国制度逻辑共存性与竞争性之时,利己性的制度创新者往往会利用旧有的制度逻辑催生出新的制度逻辑,并最终诱发制度性变革或制度性创新产生。而制度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创新问题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及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情境下的适用性则更为突出。

制度体系本身是空间、时间及人类生存环境综合的产物,尽管有些迟缓,但制度体系依然在发生着改变。制度体系变革及演进无疑将对人类社会、组织及个体的行为决策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因其所处于母国与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之下,无疑也将面临更多的制度性压力与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制度性机遇与商机,而这也恰恰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商务学者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探究跨国企业行为决策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书作者对于企业国际化问题的关注源于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博士毕业后先后承担了天津市教委及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并累积了一些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在相关研究工作进行过程中,也在持续关注、追踪企业国际化理论及跨国企业理论研究的前沿性问题及热点问题,并从中探索、选择适合自身研究工作持续深入的研究切入点及研究方向。本书是作者近期研究工作的系统总结,写作过程及最终出版得到了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关系网络构建的跨国企业制度学习及其同构效应研究”(2015M571262)资助,并作为该项目结项的重要研究成果;同时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跨国企业东道国市场‘合法化’策略选择与实施效果研究——基于制度理论视角”(16YJAGJW001)的资助,并作为该项目中期考核的重要研究成果。

在此特别感谢本书作者博士后导师、天津财经大学商学院彭正银教授的热忱帮助及悉心指导,以及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国贸系老师们的鼓励与扶持!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刘 娟

2016年10月于天津懿德园

目 录

第1章 导论	1
第2章 多维视角下制度形成及演进综述	7
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	8
2.2 制度分析及发展观点	11
2.3 基于文化层面的理论分析	13
2.4 遗传学及生物学理论分析——互惠性利他行为	16
2.5 源于神经系统科学的理论分析	18
2.6 基于生态环境视角的理论分析	20
2.7 小结	24
第3章 制度理论视角下跨国企业“合法化”研究综述	28
3.1 “合法化”概念综述	28
3.2 企业“合法化”研究分类	31
3.3 小结	40
第4章 制度距离、制度学习与跨国企业制度同构——基于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视角	44
4.1 跨国企业制度学习相关概念演进	46
4.2 跨国企业制度学习与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	49
4.3 跨国企业制度学习方式、路径	53
4.4 在华跨国企业与中国跨国企业制度学习与关系网络构建相关研究	60
4.5 跨国企业制度学习同构效果	62
4.6 外资风险资本、关系网络与国际创业企业制度学习——基于制度同构理论视角	65
4.7 关系网络与创业企业国际市场机会识别及开发——基于中小企业国际创业的跨案例研究	70
4.8 企业家社会关系网络、创业机会识别与企业国际创业海外市场选择——基于中小型国际创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80
4.9 小结	90
第5章 制度冲突与全球市场同构——基于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研究视角	93
5.1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特征	94
5.2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东道国市场上的组织合法性	97
5.3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应对发达国家市场制度压力的反应策略	100
5.4 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应对新兴市场制度压力的反应策略	102
5.5 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兴市场间制度同构	104

5.6	小结	107
第6章	制度逻辑、商业伦理与跨国企业制度性策略回应	110
6.1	制度逻辑与伦理理念研究综述	111
6.2	道德伦理压力与跨国企业社会责任深固性	115
6.3	制度逻辑与跨国企业道德伦理应对方式及策略	116
6.4	小结	123
第7章	制度逻辑、社会认同与跨国企业多元化制度安排	127
7.1	制度逻辑与制度多元化研究综述	128
7.2	制度逻辑、社会认同与跨国企业多元化制度安排	130
7.3	制度逻辑、社会认同与跨国企业管理实践转移	135
7.4	小结	139
第8章	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者与新兴市场国家制度性创新——基于 OFDI 领域研究视角	141
8.1	制度创新者与制度性创新	142
8.2	新兴市场国家 OFDI 制度演进——基于中国与俄罗斯的对比分析	145
8.3	新兴市场国家 OFDI 制度体系创新条件及特征	155
8.4	小结	157
第9章	转型经济情境下制度创新与企业运营绩效提升	159
9.1	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159
9.2	战略管理理论视角下的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161
9.3	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	163
9.4	转型经济情境下制度创新与企业绩效提升作用机理	168
9.5	小结	173
第10章	转型经济情境下竞争性制度逻辑与企业创新创业	177
10.1	竞争性制度逻辑与企业创新创业研究基础	178
10.2	竞争性制度逻辑内涵与企业创新创业作用关系	180
10.3	转型经济情境下竞争性制度逻辑对于企业创新创业研究启示	185
10.4	小结	188
第11章	制度领域拓展对国际商务理论及实践影响研究	189
11.1	制度领域再概念化研究背景	190
11.2	制度领域再概念化的适用性	192
11.3	制度领域拓展对于国际商务理论研究及实践的启示	197
11.4	制度领域拓展对于企业国际创业的影响作用——基于互联网使能研究理论分析	199
11.5	制度领域拓展对于企业国际创业的影响作用——基于互联网使能研究实证分析	223
11.6	小结	234
参考文献		236

第1章

导论

著名华裔学者彭维刚(2004)曾经指出,国际商务研究需要若干核心议题以便促使其自身的持续繁荣。而系统梳理国际商务研究文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制度理论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的聚焦作用正日益凸显。一方面,相关研究文献中凸显出一系列与制度相关的国际商务活动议题。这些议题具体包括:对外直接投资(Holmes et al.,2011)、外来者劣势(Campbell et al.,2012)、跨国企业全球资源配置(Cantwell et al.,2010)、跨国企业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 et al.,2008)、国际商务战略(Peng et al.,2008)、跨国企业对东道国制度影响(Mudambi et al.,2002)、跨国企业母国与东道国雇员认知体系差异(Lau et al.,2002)、跨国企业绩效持续性(Chacar et al.,2010)、出口增长(Shinkle et al.,2010)、国家商业体系(Witt et al.,2009)、商业网络(Drew et al.,2009;Li et al.,2011)等。这些研究议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际商务学者越来越关注制度理论在国际商务理论研究中的应用,但是另一方面,现有制度理论研究领域凸显出如此多新兴而又相对分散的研究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越来越多的国际商务学者意识到,跨国界情境下正式及非正式性制度体系对于组织战略及组织绩效的重要影响作用(Hotho et al.,2012)。而以正式性或非正式性制度架构为切入点,探究跨国企业行为决策及战略规划问题也恰好成为当前经济学及管理学项下国际商务理论研究的主流范式。

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例如学者 Holmes 等人尝试探究的议题便是一国非正式制度架构如何形成正式性政治、经济及监管性制度体系,以及这些制度体系又如何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安排。此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及组织制度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源于50个国家长达9年的相关经验数据,对非正式性制度架构对于正式性制度体系的影响作用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究。研究结论显示,一国非正式制度架构,通常以文化维度,即群体间集体主义及其未来倾向性测度,形成一国正式性制度体系,如监管层面、政治层面及经济层面的制度架构,且每一个正式性制度架构都会对该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IFDI)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作用(Holmes et al.,2011)。与上述研究类似的一些研究文献所关注的议题也大多聚焦于国际商务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融合。而借助霍姆斯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制度理论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展与完善,包括对于制度体系形成的前置变量,尤其是对市场经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构成变量的探究等。

整体而言,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探究国际商务问题,仍需要从制度理论基本前提出发,同时结合跨国界情境下企业行为决策的特有模式以及相关的约束条件,即研究重点在于,制度理论在国际化背景下、制度环境多元化情境下的适用性问题,以及相对应的企业战略规划及行为决策的有效性问题。鉴于此,本书的研究重点将从制度理论核心内容“合法性”问题着手,系统探究及深入阐述,在母国与东道国制度距离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即在制度环境多元化情境下,跨国企业如何在东道国市场获取“合法性”问题,并将基于制度同构及制

度逻辑视角,围绕跨国企业东道国市场“合法性”问题展开系统阐述。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

1. 制度形成演变与国际商务研究

当前国际商务环境正经历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高度融合。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大幅度降低,这些都使得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得以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国际商务理论学者还是常常认为,处于国际化发展阶段中的跨国企业仍需要面对“外来者劣势(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Zaheer, 1995) 问题,或是由于对东道国市场、行业、文化、政治惯例、信息网络及特定价值观项下的行为方式等理解的欠缺及必要知识的缺乏,从而导致的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潜在较低水平运营绩效或是运营失败。为此,跨国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如何正确及充分理解东道国市场客户(潜在)需求及偏好,现有传统西方企业管理哲学及实践是否可以在东道国市场有效复制。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母国与东道国间社会经济及社会政策层面的制度环境差异性以及对跨国企业东道国市场行为决策的影响问题。

系统梳理现有文献不难发现,事实上“制度(Institution)”一词自1970年之后,在社会学科研究范畴内已经被广泛采用。具体应用学科领域,除制度经济学本身之外,还包括地理学、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若是研究其应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 Giambattista Vico 的《新科学 1725》(Scienza Nuovo of 1725) (Hodgson, 2006)。整体而言,对于“制度”一词概念的具体定义,现有文献中提及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种:

- (1) 一种游戏规则(North, 1990);
- (2) 获取高度韧性的一种社会架构,由文化认知、规范、监管要素及与之关联的活动和资源构成,用以提供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并赋予其特定含义(Scott, 2010);
- (3) 相对稳定的一种已建立并具有嵌入性特征的社会规则,用以建构社会互动关系(Hodgson, 2006)。

现有文献显示,尽管“制度”理论的主流研究体系仍为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并且制度经济学确实也便利了基于时间和空间的人际间(隐性或非正式性)关系和非人格化(显性或正式性)形式在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层面的探究(Hodgson, 2006; North, 2005),但是本书基于制度领域相关文献的系统回顾,涉及社会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哲学、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神经学、生物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内容,无疑对于当前的国际商务研究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成功的制度变迁模式通常都是以现有非正式制度架构与更加明确的正式性制度架构相融合,而非简单地进行全盘的制度体系变革,而此研究结论不仅对于基于国家层面的国际商务理论研究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企业层面的跨国公司及其在东道国子公司的相关研究更具有现实指导及借鉴意义;其次,在全球化浪潮背景下,即便是那些古老且传统的制度体系也正逐渐发生着变革,对此,在国际商务事务中更需要充分认识到生态系统连同文化价值观体系构建及运作的内在机理,尤其要重视许多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或民族都保留着类似的文化遗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商业活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对于国际商务从业者而言,国际商务活动很难进入其对未来发展信心十足的“拨云见日”状态(Ambler et al., 2009)。主要原因在于这其中涉及很多复杂的影响因素(变量),而将这些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关系全部呈现出来同样非常困难。也正是基于此,在国际

商务活动中没有所谓的专家,而只有支付巨额学费的学习者。在这个领域中所有的新进入者都需要克服其自身的民族中心价值观(Ethnocentric Values)理念。但即便如此,借助现有研究成果文献综述,旨在对于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围绕制度架构相关核心问题给予充分解释,以期对新进入研究者及从业者给予更多帮助。例如,基于生物学方面的启示,如互惠性利他主义及生态系统等也会显著地增加我们对于制度体系形成及发展的理解,不至于使我们因为对某些现象的不理解而“绊倒”。需要特别提及的一点是,当在一个新的地域从事商务活动时,基于日常交易活动的经验及实践是非常重要的;而当从业者已经非常熟悉异地或跨地域经营的“游戏规则”,并且在相应的商务活动中表现出信心时,国际商务活动就已经脱离了所谓的“暗箱操作”时代。但与此同时,学者 Hotho 和 Pedersen(2012)研究也指出,不同国家间的商业运营体系差异性仍然是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经营决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尽管这些跨国企业已经拥有多年海外市场运营经验。

一言以蔽之,制度体系本身是空间、时间及人类生存环境综合的产物,尽管有些迟缓,但制度体系依然在发生着改变。制度体系变革及演进无疑对人类社会、组织及个体的行为决策都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而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因其处于母国与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之下,无疑也将面临更多的制度性压力与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制度性机遇与商机,而这也恰恰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商务学者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下探究跨国企业行为决策问题的关键所在。

2. 跨国企业东道国市场“合法化”

“合法性”或“合法化(Legitimation)”概念在政治心理学理论体系(Tyler, 1990)及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Baron et al., 1994; Haines et al., 2000; Jost et al., 1994)中均居于核心地位,并被定义为:与制度体系或是社会规范层面所定义的规范、价值观和预期相一致或符合一致性的一个过程、一种资源及相应结果(Oliver, 1996)。相应的,基于政治体系层面、制度架构或是组织层面探究合法性问题已经成为相关领域学者关注的主流研究重点(Powell et al., 1991)。

跨国企业情境下,由于母国与东道国市场往往在正式性制度体系及非正式性制度架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因而,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经营活动也无疑会面临“合法性”问题。为此,新建立或是已建立的跨国企业及其新建合资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且要经历致力于在新进入或已近进入的东道国市场中寻求合法性地位的策略规划过程,即“合法化”过程(Turcan et al., 2012)。简言之,“合法化”过程与跨国企业全球运营及其在特定东道国市场情境下的具体运营方式密切相关,“合法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取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商务活动的合法存在性,及其所感知的对于东道国情境下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规范及期望的符合性或一致性。因而,在国际商务理论研究,尤其是跨国企业理论研究领域内,“合法化”研究无疑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就现有相关文献而言,涉及跨国企业合法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仍较为分散,尚未在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内形成以合法性为中心的,具有系统性的研究脉络及体系。鉴于此,系统梳理现有“合法化”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为制度理论体系下探究跨国企业行为决策问题的后续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十分必要;与此同时,以“合法化”问题作为本书研究内容的重要逻辑起点,并借此展开后续相关研究内容。

3. 制度同构与制度学习

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与母国市场不同的制度环境,由此产生的“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即阻碍或扰乱企业与市场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制、教育水平、产业发展水平等(Johanson et al., 1975)或制度距离(Institutional Distance),即母国与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的客观存在(Kostova, 1996),使得跨国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的行为决策上必须与当地企业行为偏好保持一致,才能在东道国市场获取“合法性”地位,获取更多东道国市场运营收益(Henisz et al. 2005; Peng, 2003)。而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概念的提出则对阐释上述跨国企业行为决策具有很好的适用性。

制度同构是源自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传统制度理论学者最先提出,意指在相同环境制约条件下,有一种力量促使某一单元与其他单元具有相似性的“制约性过程”(DiMaggio, 1983)。而在国际商务理论研究领域,制度同构概念对于阐释跨国企业行为决策也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因为,当跨国企业面对东道国迥异的制度环境时,其行为决策只有与当地企业及顾客的行为偏好保持一致,才能在东道国市场获得“合法性”地位,获取更多运营收益(Henisz et al., 2005; Peng, 2003)。那么,在东道国市场进行制度同构,获取“合法性”地位的具体作用路径又是什么呢?这就引出了“制度学习(Institutional Learning)”概念。跨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后努力融入该国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同构行为便始于制度学习(Sirmon et al., 2007)。而跨国企业制度学习并不仅指对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行业规制等常规性显性知识的学习,更是指跨国企业将生产、营销、人事管理等诸多要素融入或植根于东道国制度环境内的一种重要同构行为(Xu et al., 2012)。就表现形式而言,跨国企业制度学习具体方式、路径与跨国企业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密切相关且彼此呼应。尽管现有文献基于关系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国际化行为决策的研究成果多有积累,但是基于制度同构研究视角的系统研究仍较为缺乏。例如,尽管制度学习就其表现形式而言,虽与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就其学习动机及内容的本质性差异而言,跨国企业为适应东道国不同制度环境而采取的制度学习方式、路径,必然表现为其在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过程中(区别于以往以常规性经验知识获取为主)具有特殊性的规律特征,如规律性的东道国市场进入模式等(Chan et al., 2007; Yiu et al., 2002; 李军等, 2013);鉴于现有文献尚未从制度同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阐述,故本书将在此视角下,将跨国企业制度学习方式、路径在其东道国关系网络构建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性规律特征,作为拟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进行系统剖析及阐释。

4. 制度逻辑与制度创新

相对于制度同构概念的提出,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是被制度理论学者及国际商务学者近期所关注的另一个研究热点问题。相对而言,制度理论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强调的多为制度体系在同质性居主导的结构化环境内的塑型效果(Molding Effect)。其假设条件是:组织受限于强制性制度压力(Coercive Pressures)、模仿性制度压力(Mimetic Pressures)及规范性制度压力(Normative Pressures),而后者可使其以一种可预期模式形成商业惯例或规则,从而促使同构效应(Isomorphism)形成(DiMaggio et al., 1983; Meyer et al., 1977; Powell et al., 1991; Zucker, 1977)。相应地,在海外市场运营过程中,跨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则是需要同时迎合不同的理性预期,用以在不同国家及文化背景下获得外部合法性地位(Glynn et

al., 2002)。但与此同时,学界及业界也广泛认识到,跨国企业积极应对而非消极应对东道国市场制度环境的能力同样不应被低估。有鉴于此,基于跨国企业行为决策的理论分析框架应该更多融入全球化背景下多样性及异质性特质,以及跨国企业对于这些复杂性问题的意识形成及应对能力等。任何尝试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也都必须同时包含组织及社会层面的制度性因素,在此基础上制度逻辑理论或许可以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Tan et al., 2011)。

制度逻辑是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内所持有的价值观及其相关理念体系(Friedland et al., 1991; Jackall, 1988; Lounsbury, 2007; Meyer et al., 2006; Thornton et al., 1999)。作为制度理论中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制度逻辑相关文献明显区别于传统制度理论体系下的制度同构视角(DiMaggio et al., 1983; Meyer et al., 1977; Powell et al., 1991; Zucker, 1977),而是侧重于更多强调个体或是组织以一种非确定性行为方式应对制度压力,尤其当面对制度逻辑共存性与竞争性之时(Thornton et al., 2008)。在此理论分析框架下,利己性的(Self-Interested)制度创新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会利用旧有的制度逻辑催生出新的制度逻辑,并最终诱发制度性变革(DiMaggio et al., 1988; Fligstein, 1987; Maguire et al., 2004)。而制度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创新问题在转型经济情境下及新兴市场国家跨国企业情境下的适用性则更为突出。尤其在针对跨国企业情境下的相关研究中,由制度逻辑衍生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制度逻辑移植(Transplantation of Institutional Logics)”或“逻辑移植(Logic Transplantation)”,指由于母公司原有业务扩张或业务迁移,将母公司原有制度逻辑全部或部分移植到东道国市场子公司之中(Tan et al., 2011)。尽管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多元化趋势日渐凸显,单一性的制度逻辑已经很难具有适应性,但是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概念仍然可以为解决特定制度框架下的跨国企业多元化制度安排问题提供必要的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此,本书将分若干个章节基于制度逻辑视角系统探究及诠释相关国际商务及跨国企业管理现象以及转型经济情境下的企业创新与制度逻辑的关联性问题,旨在借此提供一个更具综合性的研究框架来探究制度理论对于跨国企业层面相关个体及组织的行为决策影响作用。

5. 制度领域拓展与国际商务发展

近些年来,与制度领域相关的法律法规及相应规范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与此同时,伴随一些新的制度领域兴起(对于游戏规则的重新阐释及制定),也对传统制度领域内涵及边界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及影响作用(Martinez et al., 2012)。有鉴于此,在拓展原有制度领域界定基础上,通过聚焦于制度领域新的分类及相关规则制定,进而阐明制度领域拓展对于国际商务研究学者基于传统跨国企业理论研究的纵深进展以及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管理者及决策者的决策制定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传统制度理论认为,当一个社会中正式性制度水平较弱之时,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产权保护或契约执行法律,而社会组织会创造出替代的或非正式性的制度用以提供必需的经济治理(North, 1990, 2005)。但是当法律及行为规范并存的情况下,非正式性经济活动往往会挤占正式性经济活动,甚至会带来更大限度的非正式性收益(De Soto, 1989; Rodrik, 2003)。学者Dunning和Lundan(2008)所信奉的制度理论研究方法是“将宏观及微观层面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也即将正式性及非正式性制度安排囊括其中”,以期进一步理解当前跨国企业的不同表现形式。基于这种逻辑,有学者进而指出,基于社区结构或配置

(Community Configuration)层面出现明显不同的规制,其中,有一些形成于无边界的、分散式的空间,有一些则形成于同地协作(Co-located)式的物理空间,跨越宏观及微观制度层面(跨越或限定于一国范围内)会影响到当事方的选择集合及行为决策,进而导致成员间不同类型的交互方式,当然,也可能包括一个更大限度的,包含潜在结果的产出函数。

此外,源于现有制度理论的扩展所带来的另一层复杂性还表现在,成员方间(个体和组织)思考合法性及法律活动重要性的感知层面的细微差别。原则上而言,此种二分法可以应用于微观层面(个体或组织)的分析,也可以应用于宏观层面,例如更加宽泛的基于国家层面的分析。学者 Webb 等(2009)从理论层面曾探讨过此类问题,在强调非正规性经济重要性的同时,基于接受及坚守合法的行为规范与法律规范方面,构建出一个理论模型用以强调社会子群体(Subgroups)间的差异性。也有学者指出(Candace et al., 2012), Webb 等人的观点为扩展原有制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并且强调正式性规则与非正式性规范的交叉重叠有助于增强其行为决策主体(既包括个体决策者、组织层面的决策者,也包括国家层面的决策者)的社会选择集合。

简言之,组织和制度边界的变迁会产生相应的机遇与挑战。不仅对于那些由志趣相同的个体组成的团队(社区)而言非常重要(一些成员或有希望借此成为行业或地区领袖),对于那些跨国企业组织也有同样的影响效果,甚至基于制度空间的这些变化会最终影响到基于国家层面的商务活动及外交、政治活动的运行及结果。对此,如果跨国企业希望在所处制度领域范畴内,在新的国际商务环境中获取并维持可持续的竞争力优势,无疑需要充分意识到并且能够遵循新兴的制度规范及规则。

第2章

多维视角下制度形成及演进综述

当前国际商务环境正经历国家间相互依存的高度融合。信息通信技术及交通运输技术的改善,地区间经济一体化的深入,以及国际贸易壁垒的大幅度降低,都使得国家间相互依存度得以进一步的提高。尽管如此,国际商务理论还是常常认为处于国际化发展阶段中的企业仍需要经历“外来者劣势”(Zaheer,1995),或是由于对东道国市场、行业、文化、政治惯例、信息网络及特定价值观项下的行为方式等必要知识的缺乏,从而导致的潜在较低水平运营绩效或是运营失败。为此,跨国企业需要面对的问题包括:理解东道国市场客户需求及偏好,西方企业管理哲学及实践是否可以在东道国市场有效复制?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社会经济及社会政策层面的制度环境差异性问题的。

而事实上“制度”一词,自1970年代之后,在社会学科研究范畴内已经被广泛采用。具体应用学科领域,除制度经济学本身之外,还包括地理学、哲学、政治学及社会学。若是追溯其应用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詹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1725》。尽管在此著作中有大量富有争议性的,且与官方权威定义有别的学术思想及观点,但是若基于多种制度体系认知情境,这些观点事实上也不足为奇(Hotho et al.,2012;Scott,2010)。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许多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学者们探究制度领域相关问题时,总是习惯于使用某些专门术语,或是其自身专业领域中所特有的语言体系(Ostrom,2008),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相应研究观点的澄明及不同学科领域学者对此问题的相互理解。

整体而言,对于“制度”的定义,现有文献中提及的内容主要包括:

- (1)一种游戏规则(North,1990);
- (2)获取高度韧性的一种社会架构,由文化认知、规范、监管要素及与之关联的活动和资源构成,用以提供社会生活的稳定性并赋予其特定含义(Scott,2010);
- (3)相对稳定的一种已建立并具有嵌入性特征的社会规则,用以建构社会互动关系(Hodgson,2006)。

相对而言,“制度”理论的主流研究体系仍为制度经济学,并且制度经济学确实也便利了基于时间和空间的人际间(隐性或非正式性)和非人格化(显性或正式性)经济、政治及社会制度层面的探究(Hodgson,2006;North,2005);但与此同时,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现有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仍然缺乏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尤其在基于政治、历史及文化层面深刻阐释制度体系演变进程更为薄弱(North,2005),因此,系统清晰识别制度体系植根环境特征(变量)显得尤为必要。

制度领域相关文献的回顾,涉及社会经济学、进化心理学、进化生物学、哲学、旧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学、神经学、生物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相对而言,Hodgson(2006)提及的制度概念在上述领域当中更具一般性、可靠性及稳健性,并且在

不同理论学科中也能突显其适用性(Drew et al. ,2012)。Hodgson 曾明确指出,“在没有确切的制度或组织概念之前,不可能有所谓的制度或组织运作的理论分析或经验研究”,为此,Hodgson 在基于对现有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基础上,清晰识别出不同理论学科体系下对于制度概念内涵界定的关键性差别(表 2.1)。在此基础上,系统阐述主要聚焦制度理论研究的概念模型及理论分析框架(Drew et al. ,2012),无疑对从基于多维视角下深刻理解制度产生根源及演进路径大有裨益。

表 2.1 基本制度架构定义

分类	定义
社会结构	所有社会关系,包括那些没有规则及社会制度的特定情境
制度	已经建立起来的具有持久性的系统,通常嵌入于社会规则之内,用以架构社会互动
规则	在某人是否应该做某事的情形之下,具有广泛社会传播性及习惯性的规范性禁令,或是固有的规范性倾向
惯例	特定制度规则的实例
组织	一些特殊的机构,包含:①机构建立边界标准以及机构成员与非成员区分标准;②机构负责人管辖权限原则;③机构内部责任归属的行政管理系统
适应性	个体采取先前行为的倾向性或是基于习惯行为的心理机制

资料来源:Hodgson G M,2006.

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Douglass North 在其职业学术生涯中花费了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以探究、剖析制度的复杂性特征问题(North,1981,1990,1991,1994,1995;North et al. ,2000;North et al. ,1973;North et al. ,1989)。North 受到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的影响,同时也意识到,当时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急需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North 将制度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包括正式性制度(如法律)和非正式性制度(如习俗、宗教等),两者及其具体实施共同界定了社会的尤其是经济的激励结构。而制度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是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的,也就是制度的供给。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制度的供给通常是有限的且稀缺的。但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的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而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基本均衡之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之时,就会随之发生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

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主要有两种,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 (1)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

- (2) 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
- (3) 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
- (4) 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
- (5) 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

根据充当第一行动集团的经济主体的不同,可以把制度变迁细化为“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所谓“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是指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

简单说来,制度变迁理论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 Veblen 为创始人的开创性历史时期,制度的概念得以创立并用“累积因果论”来解释制度变迁。第二个时期是以 Clark 为代表对制度变迁理论继承和发展的时期,涉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制度与技术相互作用等问题。第三个时期是以 Galbraith 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 Coase、North 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蓬勃发展时期,此时期研究成果卓著。当然还应包括马克思、博弈论者、混沌经济学等对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North 早期研究并没有超出上述提及的思路范畴,而是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经济增长则是资本、劳动和技术参数的函数。North 热衷于用统计方法分析历史上一些国家、地区和行业的经济增长过程,试图对此进行数理化处理。如他发现 1600—1850 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明显的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运输效率却大大提高。对此现象如何给予合理解释呢? North 发现虽然技术条件并没有明显改变,但是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却发生了变化,结果导致运输成本降低,提高了海洋运输生产效率。

鉴于当时主流的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同样也存在不完善之处,需要进行“修补”,North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一书里指出:制度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种能够对个人提供有效激励的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其中产权最为重要。而“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如英国的有效产权结构、专利法的颁布;相比之下,处于同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由于没有建立类似的能有效保护私人财产和限制皇权的制度结构,进而无法对个人创新提供适当的激励机制而落后于英国社会许多年。对此,North 也认为当代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相对落后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经济组织无效率的结果。其他一些经济学者也认为,制度不足使技术进步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不起作用,这也是亚洲之所以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

简言之,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离不开对制度创新和变迁的研究。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的经济生活中,交易链条不断加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交易成本亦随之不断上升。此种情境下,唯有借助创新,尤其是制度创新方可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保障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得以有序、高效进行。在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中,人类的经济交往极大地依赖彼此可信赖且相当规律的行为模式,而所有这些人类社会行为交易及相关活动的协调、保障都无一例外地需要适宜的制度性安排。

总体而言,North 的《西方世界的兴起》重点在于阐述不同制度变革如何导致不同的经济绩效,但并没有完成对制度变迁理论的完整构建。而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一书中,North 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块基石:

- (1) 描述一个体制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
- (2) 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
- (3) 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

将产权理论与制度变迁结合是 North 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North 认为, Coase 等人创立的产权理论有助于解释人类历史上交易费用的降低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替换。依据产权理论, 在现存技术、信息成本和未来不确定因素共同约束下, 在充满资源稀缺性和竞争性的物质世界里, 解决问题的成本最小化的产权形式将是最有效率的, 而竞争必将使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替代无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

至此, North 通过揭示经济绩效大体上是由支撑市场的制度类型及质量所决定的观点, 激发了经济史上的一场革命。正如他在开启新制度经济学之门的上述两本经典著作中所表明的, 产权和交易成本是最为基本的决定性因素。此外, North 也指出, 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适应性效率, 即一个社会在创造生产性的、稳定的、公平的以及广为接受的制度体系上所具有的有效性;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制度体系要具备足够的灵活性, 从而在应对政治和经济反馈之时, 能够被迅速得以变更或被取代。

虽然坚持了早期对制度的定义, 也即制度是约束人类行为的正式或非正式规则, 但 North(2005) 在稍后的著作《理解经济变迁过程》(*Understanding of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一书中, 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方式。在本书中, North 阐释了不同社会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基础, 而这些制度性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轨迹。与此同时, 为了深入探究这些规则、制度的演化以及经济变迁的更深层次决定因素, North 拓展了先前的研究视角, 并尝试利用心理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把意识作为关键变量, 进一步揭示意识是怎样成为社会学习的结果及其随后是怎样影响经济层面的制度基础, 进而影响其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能力。整体而言,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一书不仅诠释了过去的制度变迁, 而且解释了当今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同经济绩效得以发生的原因。鉴于此, 此书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制度改革也大有裨益。

此外, North 在 2005 年指出, 对于人类社会为何发展规则、规范、惯例及相应的行为方式问题, 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同时他还强调, 借助历史学习过程, 还应该培养我们基于“非遍历性(Non-Ergodic)”视角看待世界事件的能力。而“遍历性(Ergodic)”一词常用于物理学科研究领域, 其定义为“任何一种状态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尤其包括一种状态永远不会发生的零概率事件”(North, 2005)。但是, 如果可以观测到经济变革及发展的过去及现在, 那么, 显而易见的是, “我们正处于并正在创造的社会, 是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有所不同的特定社会”(North, 2005); 而社会科学中所涉及的包括国际商务领域及经济领域在内的诸多领域, 无疑都具有“非遍历性”特征。

North 基于心理学视角, 识别出制度在经济行为感知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这些复杂的正式性及非正式性制度架构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之所在。North 进一步指出, 制度有助于降低一国政体内个人及群体的不确定性, 而政体成员也倾向于保留维系现有制度架构, 即便这样做的代价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及政治的衰落。North 还指出“政治及经济单元的功能特征随时间变化会愈加凸显”, 且两者间存在巨大差异。与此同时, 深刻理解个体、群体或社会组织决策架构的核心可能还需要借助文化或是遗传学视角。尽管文化或组织遗传学视角未必能充分揭示制度的复杂性特质, 但是毫无疑问, 这是未来制度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

整体而言, North 提供了一个探究经济及制度变迁的初步性路径依赖分析框架。这一路径依赖过程包括五个关键性的构念及一个重要的反馈回路(图 2.1)。尽管这个基本的概念模型尚无法完全涵盖支撑感知现实或是决策制定过程的重要前置影响因素,但是 North 指出,将前置变量引入概念模型无疑会增加模型预测的准确性,以及更好地预测经济及制度变革可能发生的程度及范围,而涉及前置变量的相关研究也将是未来制度理论及实证研究的重要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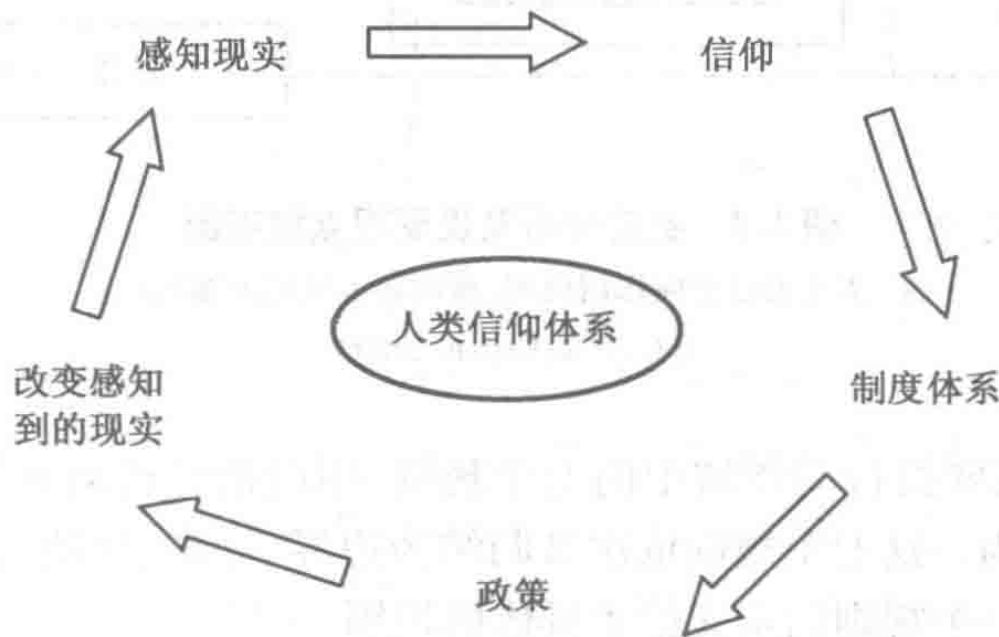


图 2.1 源于经济行为的制度决策过程
资料来源: North, 2005.

2.2 制度分析及发展观点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linor Ostrom 也与 North 的观点相一致,认为“在所有涉及的制度情境下,都存在一般性的构成要素”。Ostrom 认为,制度分析及发展(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AD)研究已经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Crawford et al., 1995; Keiser et al., 1982; Oakerson, 1982; Ostrom, 1986, 1999, 2011; Ostrom et al., 1994),在此期间,很多研究也涉及基于经验数据的制度理论分析及验证,并且借此也使得制度理论不断得到应用及完善。

现有制度分析及发展文献主要涉及三大类:外生变量、行动领域及结果。这三大类研究的交错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制度理论在不同层面的深入及拓展(Ostrom, 2008)。

通常,外生变量会影响到行动者在行动领域内所处情境及行动经验,而这些外生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又会产生出特定的作用结果;这些作用结果进而又会反馈给行动者、外生变量以及系统中的其他相关变量。整体而言,反馈对于行动者而言极为关键,或极具价值,原因是其可以导致行为的制度化形成(在行动领域内);但是,需要提及的一点是,对于行动者而言,较低价值含量的反馈可能会导致行动者借助所处制度情境的改善,或是行动者自身及相关外生变量的改变等而开始采取制度变革行为。为了便于更为深刻的分析,三类研究体系作用关系的系统展示如图 2.2 所示。分析框架内初始外生变量得以系统展示,并归结为以下三类:规则应用、物理或物质条件、社会属性。